

墨子的言语观

陈立中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摘要: 通过研究墨子对言语行为的看法, 认为墨子的言语观有以下几点值得今人思考和借鉴: (1) 行政管理依赖于有效的信息沟通, 要使上级的行政指令顺利下达并得到圆满的执行, 下级的情况能得到及时的上报, 达到“尚同”的境界。(2) 对君主或上级的过失, 臣下应当直言劝谏而不是阿谀奉承。(3) 对人家说的话一定要加以明辨, 不能因人废言, 也不能因言废人。(4) 说话必须要有根据, 符合“国家人民之利”。(5) 说话应“择要而从事”, 做到有的放矢; 说出的话应当切实可行而且“口言之, 身必行之”, 言行一致。

关键词: 墨子; 言语观; 语言艺术

中图分类号: H0-05; B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2-0270-04

墨子是先秦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与先秦诸子中的其他大多数思想家一样, 墨子是从哲学的角度涉及到言语问题的。他的言语观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而深深地打上了墨家思想的烙印。

一、上下情请为通

有效的信息沟通是行政管理的重要基础。墨子认为“上下情请为通”是古人治国的一大要着, 也是实现墨子提出的“尚同”主张的重要前提。

第一, 要使上级的指令顺利下达并得到圆满的执行。“古者国君诸侯之以春秋来朝聘天子之廷, 受天子之言教, 退而治国, 政之所加, 莫敢不宾。当此之时, 本无有敢纷天子之教者。”(《尚同中》) 为达到这一目标, 必须统一国民的意志。他说: “古者之民始生, 未有正长之时, 盖其语曰: 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 二人则二义, 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 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 以非人之义, 故交相非也”, 人们各执己见, 以言语相互攻击, 以致“隐慝良道, 不以相教。天下之乱, 若禽兽然。”为改变这种因缺乏沟通、意见不统一而造成的纷乱局面, 上天选取天下的仁人贤者, 立为天子、三公、诸侯国君、乡长、里长, 人们关于是非善恶的意见要以他们的观点为准则。天下百姓“闻善而不善, 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 必皆是之; 所非, 必皆非之”。(《尚同上》)

第二, 要使下级的情况能及时得到上报。墨子深知“上之为政, 得下之情则治, 不得下之情则乱”的道理, “一耳之听也, 不若二耳之听也。”(《尚同下》) 古代的圣人常注意广开言路, 使下级将各方面的情况如实地汇报上来。“古者诸侯国君之闻见善与不善也, 皆驰驱以告天子。”(《尚同中》) 他们善于发挥下级在搜集基层信息和传播统治信息方面的主观能动性, “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 使人之吻助己言谈, 使人之心助己思虑, 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尚同中》), 因此“助之视听者众”, “不往而视也, 不就而听也。”(《尚同下》)

墨子认为, 要做到“上下情请为通”, 就必须从家庭开始逐级“尚同”。他说: 如果家人都能“见爱利家者必以告”, “见恶贼家者亦必以告”, “善言之, 不善言之”, 就能使家君赏罚得当, “家必治矣”(《尚同下》)。如果里人“闻善而不善, 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 必皆是之; 乡长之所非, 必皆非之”; 乡人“闻善而不善, 必以告国君。国君之所是, 必皆是之; 国君之所非, 必皆非之”; 国人“闻善而不善, 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 皆是之; 天子之所非, 皆非之”; “天下既已治, 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尚同上》), 这才是真正的“尚同”。

二、嬖臣伤君, 谄下伤上

鲁君的嬖妾死了, 鲁人为讨好鲁君而写了一篇

谀文，鲁君喜其夸饰而加以采用。墨子听说这事，讥笑说这是用牦牛的头作衣服，这样的事情是有害于国家的。墨子非常重视臣下在沟通君王与百姓之间信息和匡正君王过失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说：“嬖臣伤君，谄下伤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谀谀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谀谀，焉可以长生保国。”（《亲士》）得宠而谄媚的臣下必定会伤害君主。君主一定要有直言不讳的臣子；臣子能据理力争，决无阿谀之风，国家才能长存不衰。如果“臣下重爵位而不言”，“所誉不当贤，而所罚不当暴”，近臣默不作声，远臣只能嗟叹，怨恨郁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亲士》《尚贤中》）

鲁阳文君问墨子：“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处则静，呼则应”的人是忠臣吗？墨子说：他就像回声一样，君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在我看来，所谓忠臣，应该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尚贤下》）的人，上级有过失，就伺机劝谏，匡正君主的偏邪而将他引入正道；自己有好的见解，便告诉君主而不敢告诉别人，是非善恶都统一于上级，不在下面结党营私。他使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安乐在上而忧戚在下。（《鲁问》）对这样的人，“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则“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尚贤下》）臣下“知而不争，不可谓忠。”（《公输》）

有儒者称：君子抱手等待，“问焉则言，不问焉则止”，就像钟一样，“扣则鸣，不扣则不鸣”。墨子驳斥说：如果王公大人荒淫暴虐，国难在即，进谏便说是不恭顺，依靠近臣转达自己的意见又说是在背后议论，君子“必以谏”，“虽不扣，必鸣也”。如果王公大人要去攻打无罪之国，出师必受屈辱，受攻击者不利，进攻者也不利，君子“虽不扣，必鸣者也”。（《公孟》）侍奉君王就应竭尽忠心，侍奉父母就应竭尽孝心，君王、父母勉力从善就加以赞美，他们出现过错就加以规谏，这是做臣为了的基本要求。如果“隐知豫力，恬漠待问而后对，虽有君亲之大利，弗问不言”，甚至在祸难临头而惟独自己知晓的情况下仍然是“不问不言”，自己就将成为大乱的祸根。

墨子也承认“良才难令”（《亲士》），忠臣常常因直言不讳而得不到君主的理解和宽容，甚至给自己招来祸患。“比干之殢，其抗也。”（《亲士》）比干的遭遇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所以墨子在《七患》中称“君

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是造成国家危亡的祸患。

三、 潜愿之言，无入之耳； 批捍之声，无出之口

墨子把加强语言修养当做修身养性的重要内容。他说：“潜愿之言，无入之耳；批捍之声，无出之口。”（《修身》）如果一个人能不听信恶意毁谤的话语，不说出攻击别人的言论，不存有伤害别人的恶念，那么即使人家存心诋毁，也是找不到理由的。这句话实际上谈到了听和说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 纳言

墨子说：“古者王公大人从政于国家者，情欲（毁）誉之审。”（《非功中》）王公大人统治国家是这样，个人修身养性何尝不是如此呢？对别人的言语一定要加以明辨：不要听信恶意毁谤与阿谀奉承的话，但应虚心听取良言善语。第一，不能因人废言，不能因为别人社会地位低下等原因而听不进别人的良言。墨子南游到了楚国，献惠王以年老为由推辞接见，而派穆贺去见墨子。穆贺与墨子交谈后大喜，对墨子说：您的话确实说得好，但君王是天下的大王，恐怕是因为您是一个普通百姓而对您的主张不加采纳吧！墨子说：“唯其可行，譬若药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顺其疾，岂曰一草之本而不是哉？”（《贵义》）第二，不能因言废人，因为别人说的话不中听就全盘否定这个人。有弟子对墨子说：“告子说你口说仁义而行为恶劣，请你抛弃他。”墨子说：“不可。……告子很善强辩，诽谤我的行为却不否定我仁义的言论，这总比没有任何称赞和诽谤好。”（《公孟》）第三，由于不修养自己的德行而受到人们的毁谤，那就应该反思自问，这样才能减少别人对自己的怨谤，而自己也具有一定的品德修养了。

（二） 言则诲

与孔子主张“述而不作”不同，墨子主张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耕柱》），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言语的力量，劝人为善。他说：那些极端无君子品格的人既不阐述“古之善者”，又不创作“今之善者”。第二等缺乏君子品格的人不阐述“古之善者”，但创作“己之善者”，希望好的东西都出于自己。这两类人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墨子主张“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以使好的东西更多。（《耕柱》）儒者可能会问：“你到处逢人就劝他为善，多累啊！”墨子说：“如今求善者少，不

努力去劝说别人,就会没人知道应该为善。……两人都主张仁义,劝人行仁义的人就要比居家不出的人功劳大。为什么不出去劝人为善呢?”(《公孟》)吴虑冬陶夏耕,白比于舜,对墨子说:“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墨子说:“独白一人耕作、织布、作战‘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鲁问》)

墨子强调,说话时一定要仔细考虑自己的话是否能给人带来教益而体现“兼爱”的原则,就像“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沮”(《非命中》)。因此,必须“节于身,诲于民”(《节用下》);“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规谏其君长,下有以教顺其百姓”(《非命中》)。君子“出于口者,无以竭驯”(《修身》),全是合乎情理的言辞。为贤之道即“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能做到“有道肆相教诲”(《兼爱下》),“嘿则思,言则诲,动则事”,“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的人“必为圣人”。(《贵义》)桀纣幽厉“上诟天,中诟鬼,下贼人”(《天志上》),受到惩罚是理所应当的,后世应当从中吸取教训。墨子引述先王之书《术令》上的话说:“唯口出好兴戎。”同样是说话,“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为谗贼寇戎”(《尚同中》)。说话能不慎重吗?

四、言有三仪

墨子说:天下人言语纷纷,莫衷一是,“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须用“天下之明法”才能加以明辨。(《天志上》)这“天下之明法”究竟是什么样呢?

墨子指出,凡“出言谈”、“为文学”,“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因此不可不先立仪法。说话如果没有准则,就像是要在转动着的钧轮上面分清东西南北,“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如今天下真假难辨,所以必须确立三条说话的准则,做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一是说话要有根据,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考之天、鬼之志”;二是要有实证,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征以先王之书”;三是要有效用,要看是否符合“国家人民之利”。(《非命下》)

墨子强调:“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

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贵义》)他说:“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天志中》)贤人应该是“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于下必利上”(《非儒下》),如果口出不祥之言,就像以刀伤人,不仅会伤害别人,常常也会伤害到自己。巫马子提出“义”就是“杀彼以利我,无杀我以利彼”的主张,墨子问他:“你将隐瞒你的主张还是将它告诉别人呢?”巫马子说:“我为什么要隐瞒我的主张呢?我会告诉别人。”墨子说:如果是这样,那么有一个人喜欢你的主张,就会有一个人杀你以有利于自己……天下的人都喜欢你的主张,天下的人就都会杀你以有利于自己。如果有一个不喜欢你的主张,就会有一个人因为你是散布不祥言论要杀你天下的人都不喜欢你的主张,天下的人就会要杀你,因为你是散布不祥言论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来有什么好处呢?(《耕柱》)

墨子提出:“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怎么知道古人说过、做过些什么呢?墨子说:“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兼爱下》)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反对像儒者那样盲目迷信、模仿古人的言行。他说:同是商王纣之臣,费仲是天下的暴人,箕子、微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们说着同样的话却一个仁一个不仁,可见,关键不在于重述古人的言语,而在于透过古人的言语吸收古人治国修身的经验。(《公孟》)

墨子强调,说话应言之有据,合于百姓耳目之实。他提出了“取实予名”(《贵义》)的重要观点。“名”即概念,“实”即客观事物,“实”不依赖“名”,而“名”必须符合“实”。不过,尽管人们都在使用着相同的一些概念名称,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将名与实有机地联系起来。他打了一个比方,盲人说:“银子是白色的,烟灰是黑色的。”但是,把白的和黑的东西放在一起,盲人就分不清楚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能说出白、黑的名称,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视觉能力,无法在白与黑的东西中作出选择。“如今天下的君子称说‘仁’的名称,即便是禹汤都不能动摇他们的观点。要是把‘仁’的事情和不‘仁’的事情混杂在一起,让他们分辨,他们就弄不清了。所以说,天下的君子不能分清仁与不仁,不是因为名称的原因,同样是因为他们无法择取。”(《贵义》)因此,说话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么动听,而在于言语与实际相符。

五、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

墨子认为“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修身》)。“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修身》)言语的力量不在于词句的多少,也不在于文辞的优劣。那么,言语的力量从何而来呢?

第一,说话要“择要而从事”,有的放矢。有一次,魏越问墨子:“如果被各地诸侯接见,你将对他们说些什么?”墨子说,到了一个国家,必定选择最重要的事情进行劝导:“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困,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鲁问》)墨子认为,说话的内容和形式都应该根据语境因素(如对象、场合、对方说话的方式等)来灵活地确定。“应对习俗的言辞,能做到切合事理,固然是敏达的表现。面对严词相诘,我必以严词相敌;对方缓言相让,我也必缓言以对。如果平时应酬之辞必求其切合事理,那就像背着车辕去打蛾了”,是小题大做了。(《公孟》)

第二,说出口的言论应该是可以付诸实施的。“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耕柱》)在言语说出口之前就应谨慎地考虑它是否可行,要像伯夷、禹、稷三位圣人一样“谨其言,慎其行”(《尚贤中》)。

第三,话既已说出口就应该付诸行动,不能“口言之而身不行”。“口言之而身不行,说明你自相矛盾。不能管理好自己,又怎么能管理好国家政务呢?”(《公孟》)

第四,所做的与所说的应该一致,不能“说话则

称崇商汤周文,行为却与猪狗相类比”(《耕柱》)。墨子说:“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因为他们“居处言语皆尚贤;逮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莫知尚贤而使能”(《尚贤下》)。季孙绍与孟伯常共同治理鲁国的政务,两人互不信任,却在神庙中祝告说:“希望使我们和好”。墨子讽刺他们说:“这就像各自遮住了自己的眼睛,却在神庙中祝告说:‘希望让我们都能看见。’岂不是太荒谬了吗?”(《耕柱》)墨子主张,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应该“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尚贤中》)。

墨子从哲学地角度,强调语言修养在治国、修身等方面重要性,探讨了言语准则和语言艺术等问题。他的观点虽然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以上精彩论述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 [1] 郝风. 墨子“言有三法”[J]. 石油政工研究, 2001, (2): 38.
- [2] 陈立中. 孔子的语言观. 语文研究与探索[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9.
- [3] 陈立中. 老庄语言观综述[J]. 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7, (5): 20.
- [4] 陈立中. 荀子的语言观. 言论丛[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0.
- [5] 刘文英. 中国古代意识观念的产生和发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 [6] 王焕德. 墨子校释[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4.
- [7] 徐希燕. 墨家对于概念“名”的研究[J]. 学术论坛, 2000, (6): 25-28.
- [8] 徐希燕. 墨家关于逻辑学之判断的研究[J]. 平顶山师专学报, 2002, 17(3): 82-85.
- [9] 徐希燕. 墨子的认识论研究[J]. 青海社会科学, 1999, (2): 64-69.

On the speech viewpoints of Mozi

Chen Lirzh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gives an outline of the speech viewpoints of Mozi. In his book, Mozi maintains that there must be ample and valid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the leader and the subordinates, and the leader should not believe the flatteries of sycophants but should heed the sincere advice with an open mind. Mozi advanced some requirements of speech, for example, “the speech should be given with good grounds and be of benefit to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Key words: Mozi; speech viewpoints; skill of speech